

总摇摇序

谈翻译,我们首先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翻译,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在人类的文化交流中一直在广泛地进行着,但在历史中却很少得到世人的关注;丰富的翻译活动,一直被实践者认为是充满障碍的工作,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却很少有学者对其进行深入而系统的研究。这两个方面情况的长期存在,或者说翻译领域被历史学界、被理论界长期忽视的状况造成的直接影响便是,翻译一直被当作一种“雕虫小技”。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内,语言学家对翻译问题不予重视,历史学家对翻译活动熟视无睹,知识界对翻译的认识几乎是零。这在很大程度上使翻译活动在两个方面被遮蔽:一是翻译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作用得不到足够的承认;二是对翻译的种种问题得不到科学、系统的研究。尤为耐人寻味的是,对翻译的这种轻视态度不仅仅来自翻译界的外部,而且还来自翻译界的内部。翻译界内部的这种自我定位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他学科对翻译的看法,渐渐地也在有关的学界形成一种偏见:翻译为雕虫小技,不登大雅之堂。因此,翻译的作用得不到应有的承认,对翻译的理论研究得不到学界的关注和支持。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才逐渐开始改变。

长期以来翻译家本身专注于翻译实践,忽视了对翻译问题的理性思考

与系统研究 这不能不说是个历史的误会。但是,丰富的实践与贫乏的理论之间所产生的这道深深的裂痕却不能完全掩盖在数千年的翻译历史中。翻译活动的特殊性提出了种种问题和困难,而面对这些问题和困难,翻译家们也不可能视而不见,无动于衷,因为它们是无法回避的客观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翻译家们对翻译理论思考的忽视,并不说明翻译就没有理论研究的必要,也并不意味着翻译的种种问题因为翻译家的忽略便不存在。

事实上,在漫长的翻译历史中,翻译家们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进行着形式多样的丰富实践,虽然对实践中所出现的问题,还没有以一种清醒的理论意识去加以关注,但他们针对这些问题所采取的种种手法、策略,他们在实践中积累的一些经验、体会,尤其是他们从中悟出的一些道理或原则,是一笔笔非常珍贵的遗产。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弥足珍贵的译事经验,由于学界长期以来没有予以重视与关注,像一颗颗散落的珍珠,被历史所尘封,无法发出其耀眼的光芒。

从上个世纪 50 年代开始,一批具有强烈的探索精神和清醒理论意识的学者,如前苏联的费道罗夫、英国的卡特福德、加拿大的维纳与达尔贝勒内、法国的乔治·穆南等,试图以语言学为指导,打开翻译研究的大门,将数千年来一直处在技艺层面的翻译经验纳入理论的思考、系统的分析与科学的探索范围。到了 70 年代,出现了以美国尤金·奈达为代表的一批翻译理论家,他们不断拓展翻译研究领域,将翻译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为翻译学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上个世纪 70 年代以后,翻译界的一批有识之士将目光投向被历史尘封的一笔笔珍贵的翻译遗产。他们一方面追踪历史上的重大翻译事件,将翻译家的实践置于宽阔的历史空间加以认识与定位;另一方面对伴随着翻译活动而产生的点滴思考与经验体会加以梳理与探讨。以现代学理对传统的翻译经验加以阐释,为我们开辟了一条深化翻译

理论研究的重要途径。同时,客观上也促使被历史遗忘或忽视的翻译活动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如果说翻译在历史上曾长期受到冷落,处于历史边缘的话,那么正是借助现代学理,借助哲学、美学、语言学、符号学、文艺学等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丰富并加深了人们对翻译的认识,不断拓展翻译研究的领域,使翻译活动在历史的舞台上逐渐占据本应属于自己的位置,从历史的边缘开始走向中心。

在把翻译从边缘推向中心的历史进程中,语言学家们充当了先锋的角色。如费道罗夫、卡特福德、维纳与达尔贝勒内、乔治·穆南等从语言学的角度,对翻译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其贡献是多方面的。是翻译的语言学研究把翻译从经验主义中解放出来,为翻译研究打开了科学的大门,历史上第一次赋予了翻译研究科学的性质,将过去近两千年来一直在经验层面讨论或争论不休的问题置在科学的层面进行探讨。但翻译活动十分复杂,涉及的因素多,范围广,有关翻译的许多问题,如翻译者的主观因素、语言转换中的文化移植、影响翻译的社会、政治因素等问题,在语言学层面难以展开系统和深入的分析,得不出令人信服的答案,翻译历史上的众多现象也无法得到辩证的解释。翻译的语言学研究途径暴露出的这些局限,不仅使其他学科理论的介入显得非常必要,更为这些学科自身的发展提供了崭新的探索空间。

当回过头去,对自上个世纪 80 年代以来翻译研究所走过的路作以回顾性的审视时,我们不难看到以下几点:一是翻译研究在近半个世纪以来得到了突破性的发展,其广度和深度都是在过去任何一个时期所未能达到的;二是翻译研究的途径得到不断开拓,各种翻译研究流派纷呈,出现了一大批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三是翻译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与发展越来越受到其他学界的关注与承认。在国外,从上个世纪 80 年代末起,就有学者开始对 80 年代以后的翻译理论研究状况进行分析与总结,如加拿大的罗

贝尔·拉罗兹、英国的埃德温·根茨勒,他们分别于1982年与1986年发表了同名著作《当代翻译理论》。前者以翻译所涉及的基本问题为核心,对上个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在翻译理论研究领域比较活跃的代表人物的观点与思想进行评述,后者则根据自第二次世界大战至20世纪90年代初西方翻译理论研究的发展状况,以不同的观点和重要著作为依据,将当代的翻译理论分为“美国翻译培训派”、“翻译科学派”、“早期翻译研究派”、“多元体系派”和“解构主义派”等五大流派。香港的陈德鸿与张南峰编写的《西方翻译理论精选》收录了西方10位重要翻译理论家主要著作的部分章节的译文,这10位译学理论家中,除德莱顿、泰特勒、施莱尔马赫猿位之外,其余7位均是当代的。根据编者的划分,西方译学研究界的这10位代表人物被列入远学派、语文学派、诠释学派、语言学派、目的学派、文化学派、解构学派。除传统的语文学派,其余的7个流派都是近20年来发展起来的。在《西方翻译理论精选》的绪论中,两位编者这样说道:“西方的翻译理论,除了语言学派和传统的语文学派之外,还有近一二十年才兴起或盛行的翻译研究学派,以及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学派,可谓百花齐放。”如果再把我们的视野扩大一些,还可列举出符号学派、交际学派、语言哲学派、文艺学派等翻译流派。从历史上长期以来“不入流”的翻译经验之谈到20世纪末令人眼花缭乱的翻译流派的形成,我们可以看到,翻译的理论研究开始或已经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时代。透过这些被冠以各种名称的翻译思想或观点,我们不难看到相同的一点,那就是借助其他学科的理论成果,对翻译进行研究。以语言学的理论指导产生的研究成果被统称为“语言学派”,以女性主义理论为参照的研究,被冠以“女性主义翻译流派”。总之,一种理论的介入,从积极的角度讲,都会给人们认识与研究翻译打开一条新的通道。

借助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客观上确实为翻译研究拓展了巨大的空

间,为翻译研究注入了科学的活力,渐渐地从边缘开始走向中心。翻译作为一种复杂的活动,涉及面广,若仅仅局限在一个领域对之进行研究,无法揭示其性质及活动规律。在这个意义上,翻译研究必定具有综合性。但是,当各种学科的理论介入翻译研究领域之后,当我们在为翻译研究由此进入全面发展而欣喜的同时,不能不看到在种种理论指导下取得的研究成果存在着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如同“盲人摸象”,每一种理论流派所认识的翻译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片面性,揭示的只是翻译活动的一个方面,难以深刻地反映翻译活动的全貌。此外,在理论的层面上,从目前翻译理论研究的现状看,还出现了“理论+翻译”的两张皮现象,有的理论只浮在表面,难以真正起到指导翻译研究的作用。最为值得注意的是,翻译研究在引进各种理论的同时,有一种被其吞食、并吞的趋向,翻译研究的领域看似不断扩大,但在翻译从边缘走向中心的路途中,却潜伏着又一步步失去自己位置的危险。面对这一危险,我们不能不清醒地保持独立的翻译学科意识,从翻译学建设的高度去系统地探索翻译理论问题,而在上海译文出版社支持下主编的这套《译学新论丛书》正是向这一方向努力的具体体现。

《译学新论丛书》有着明确的追求:一是入选的课题力求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和原创性,能为翻译学科的理论建设和发展起到推动作用;二是研究力求具有系统性,以强烈的问题意识、科学的研究方法、扎实的论证和翔实的资料保证研究的质量;三是研究力求开放性,其开放性要求研究者既要有宽阔的理论视野,又要把握国际翻译理论研究前沿的进展状况,特别要在研究中具有探索的精神,力求有所创新。但愿在翻译界同仁的支持下,在各位作者的努力下,我们的追求能一步步得以实现。

主编

二〇〇九年 怨月 愿日于南京大学

目 录

Contents

前 言 轶

第一章 绪论 轶

引子 轶

第一节 摇摇双语词典译义研究的内容与目的 轶

第二节 摇摇双语词典译义研究的前提 轶

第三节 摇摇双语词典译义研究的多元理据 轶

第四节 摇摇小结 轶

第二章 自然词汇语义的复杂性 轶

第一节 摇摇自然语言产生的多元基础 轶

第二节 摇摇自然词汇语义生成及其演变的生理机制与特点 轶

第三节 摇摇自然词汇语义生成及其演变的多重语境与语义
层次性 轶

第四节 摇摇自然词汇的语言意义与言语意义 轶

第五节 摇摇第二语言词汇语义学习的特征 轶

目 录
Contents

第三章	双语词典译义的系统构建	/ 愿
	第一节 摇摇双语词典的目的再认识	/ 愿
	第二节 摇摇双语词典译义的系统特征	/ 愿
第四章	双语词典译义的原型特征	/ 愿
	第一节 摇摇词汇语义认知与原型	/ 愿
	第二节 摇摇双语词典译义系统中的原型构成描述	/ 愿
	第三节 摇摇双语词典译义系统中的例证	/ 愿
第五章	双语词典翻译的特殊性研究	/ 愿
	第一节 摇摇双语词典翻译研究的必要性及其意义	/ 愿
	第二节 摇摇双语词典翻译的本质特征描述	/ 愿
	第三节 摇摇双语词典译义的现代等值观	/ 愿
	第四节 摇摇双语词典翻译的类型	/ 愿
第六章	双语词典译义批评的新思维	/ 愿
	第一节 摇摇双语词典译义批评的界定及其研究对象	/ 愿

目 录

Contents

第二节 摇摇 双语词典译义批评的科学性及其相关理据	摇摇圆
第三节 摇摇 双语词典译义批评的基本类型	摇摇源
第四节 摇摇 双语词典译义批评范式的转变与新标准的确立	摇摇缘
第七章 结论	摇摇猿
第一节 摇摇 双语词典译义研究的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	摇摇远
第二节 摇摇 双语词典译义研究可拓展的空间	摇摇源
参考文献	摇摇远
后记	摇摇圆

前摇摇言

释义研究一直是中外词典学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可以说是词典学理论研究和词典编纂实践领域共同关注的永恒主题,因为它是词典编纂工作的灵魂所在。我对词典编纂中所涉及的语义问题的兴趣可以追溯到 1984 年之前。当时,我还在攻读硕士学位,研究方向是双语词典学。同时,我也在跟随导师张柏然教授从事一部大型英汉双语词典的编纂工作。我的硕士学位论文就是关于双语词典编纂过程中的语义分析研究。在做硕士学位论文的过程中,我在导师的引导下,对双语词典编纂过程中的语义问题进行了一些初浅的研究探索,有了一些初步的认识。随后的 19 多年里,我一直在从事双语词典的编纂工作,同时也进行双语词典学的专业教学与理论研究,逐步积累了不少这方面的心得,也写过一些相关的小论文。但是,真正促使我对双语词典的译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是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

经过自己多年的双语词典编纂实践,我对双语词典译义的本质有了越来越深刻的理解与感悟。然而,在大量阅读双语词典学理论研究文献的过程中,我却发现,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词典学研究领域,双语词典的译义问题都可以说是个研究薄弱点或者说是一项研究空白。尽管有少数的词典学专家学者对双语词典的译义本质有比较明确的认识,但真

正对双语词典释义这一双语词典学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进行系统而深入探讨的几乎罕见。1993年至1994年我有机会作为访问学者赴英国伯明翰大学的词典学研究中心进修,在国外学习的过程中,我注意到西方辞学界对单语词典的释义问题有着较为深入系统的研究而对双语词典的释义问题却少有人问津。由此,我萌生了对双语词典释义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的理性探索的想法,得到了张柏然教授的支持与鼓励,并以此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开始了对该问题的全面认真的思考。本书就是在我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

本书的研究,从研究主题来看,仍属于传统的基础理论研究。但是,本书的研究与以往的双语词典释义研究相比又有着鲜明的创新特征。这种创新性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研究对象的重新界定。传统的双语词典学理论研究中,释义与译义的概念一直界定不明确,经常是不作实质性的区分,以至于长期以来人们对双语词典的译义缺乏足够清楚的认识,也更谈不上全面而系统的译义研究,正所谓“名不正而言不顺”。本书是对双语词典译义系统研究的尝试,也是为区别于单语词典释义的双语词典译义研究正名。当然,译义的概念并不是本书的首创,国内词典学界早有专家学者提及,但双语词典译义问题的特殊性并未得到普遍的重视,仅有的一些有关译义的论述也只是简单提及而且研究对象仍滞留于传统的对应词研究,缺乏真正意义上的译义个性研究。本书的研究突破了双语词典译义研究的传统模式,即对应词研究的单一模式,是对包括对应词研究在内的双语词典译义的宏观与微观并重的系统综合研究。其次,研究取向的创新。传统的双语词典译义研究属于单一的本质认识论范畴,它所关注的是译义内容的静态本质认知,即译义内容是什么的语义分析与阐释,很少探讨译义的本质存在、本质价值以及本质发生的问题。而从哲学意义上来说,对任何事物或现象的本质研究

应该是多元的,即包括认识论本质、存在论本质、价值论本质以及发生论本质在内的综合考察,这种现代多元本质论的研究取向要比传统的单一本质论研究取向更加全面合理。本书的研究所采取的就是这种现代多元本质论的研究取向,它不仅仅研究“译义是什么?”的问题,还要考察“译义如何存在?”、“译义如何评价?”以及“译义如何发生?”等等与译义本质密切相关的内容。具体来说,现代多元本质论意义上的双语词典译义研究应该包括四个方面,即(员)双语词典的认识论本质研究,即双语词典的译义是什么?它主要是指以对应词为具体表现形式的微观语义分析;(圆)双语词典译义的存在论本质研究,即双语词典的译义如何存在?它主要是指包括多种宏观和微观译义手段在内的双语词典译义活动的系统安排;(猿)双语词典译义的价值论本质研究,即双语词典的译义如何评价?它主要是关于双语词典译义对其认知主体的价值如何的综合判断;(源)双语词典译义的发生论本质研究,即双语词典的译义如何发生?它主要是对双语词典译义及其效果的获得过程的动态考察。通过这四个方面的研究,我们可以对双语词典译义有个比较全面的本质认知。第三,研究理据的创新。传统的双语词典译义研究,其研究理据主要是语义学理论,人们更多关注的是原语词汇单位与译语词汇单位之间的语义成分对比分析,属于词汇语义的微观研究,基本局限于语言学研究的范畴。本书的研究则借鉴了哲学研究中的多元本质论观点、系统科学研究中的系统论观点以及认知心理学研究中的认知建构论观点,立足于包括语义研究理据、双语词典学研究理据、翻译研究理据以及接受反应论研究理据等在内的多元研究理据,在更加广阔的研究视野中来考察双语词典的译义问题,真正体现了词典学研究的多边缘跨学科特征。第四,拓展了新的研究领域。本书首次对双语词典中的翻译特殊性问题进行了理论方面的探索,同时对双语词典的译义批评问题也进行了初步

的系统研究。这两方面的研究应该说是传统双语词典译义研究中比较薄弱的环节甚至是被忽视的研究空白。本书在这两方面内容的拓展研究是对双语词典学理论系统构建的一个有益补充。

传统的双语词典译义研究,与日益蓬勃发展的双语词典编纂实践相比,长期处于滞后的状态,远不能满足双语词典编纂领域的理论指导需要。现代双语词典编纂实践的迅猛发展呼唤现代双语词典学理论的建设。本书是对双语词典译义问题系统性研究的初步尝试,对于双语词典学理论的系统构建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从这方面来说,本书的研究,应该是有着积极的理论构建意识的。另一方面,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双语词典的编纂与出版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兴旺局面,但真正能够契合广大外语学习者的语言文化认知需求的高质量的双语词典并不多见,双语词典编纂的总体质量有待进一步的提高,而且,由于国外西方单语学习词典的不断引进,词典市场的竞争日益严峻,我们要想保持在双语词典编纂领域的话语主动权,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要多出双语词典的精品。而实践的进步则离不开理论的指导。本书的研究也是立足于我国双语词典编纂与出版的现状所进行的相关理论探索,也是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的。

本书共分七章。第一章是绪论部分,它概要地介绍了本书的研究内容与目的,同时还简要地对词典学,特别是双语词典学研究领域中同类问题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进行了回顾与分析,提出了本书研究的独特取向、方法以及多元研究理据。第二章是全书论述的一个重要铺垫,主要阐述了自然词汇语义的复杂性。此外,本章还对自然词汇的语言意义与言语意义进行了充分的阐述与区分,同时还仔细地分析了双语词典的使用者——外语学习者在词汇语义学习方面的特征。第三章主要是对双语词典译义的系统特征的描述与分析。作者从对双语词典目的的再认

识入手,分析了传统双语词典译义功能的主要缺失并对现代双语词典译义的功能进行了相应的论述。在此基础上,作者还以现代系统论为理据,就现代双语词典译义的系统性特征进行了探讨,即双语词典译义系统的整体性、层次性和动态性。第四章则是对由双语词典译义系统各构成要素所具体体现出来的原型特征进行了论述。本章主要是从现代心理学研究的认知建构学习理论受到启发,强调现代双语词典的译义要想为外语学习者的词汇语义知识的构建有所裨益,应该在词典文本内容的选择和安排方面下功夫。此外,双语词典译义系统的各相关环节还应该具有原型特征,因为原型在词汇语义认知建构方面有很重要的价值。第五章所探讨的是双语词典翻译的特殊性问题。双语词典翻译具有明确的认知价值取向。此外,双语词典翻译在实践方法与形式方面也与普通的篇章翻译不同,表现出明显的变译特征。在本章的末尾,作者还结合具体的实例,就双语词典翻译实践中的具体类型进行了分析与比较,有一定的实用价值。第六章涉及了双语词典译义的批评问题,也是比较重要的内容。从现代词典学理论的系统构建来看,词典批评是词典学理论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双语词典译义的理论研究自然也要关注双语词典译义的批评问题。第七章是本书的结论部分。

本书的研究只是双语词典译义研究的一个探索性的尝试,其实双语词典的译义研究还有着相当广阔的拓展空间。首先,双语词典译义的形式创新问题。其次,双语词典译义的结构优化问题。第三,双语词典译义研究还应关注汉英双语词典的译义问题。本书作者也将在此书的研究基础上,结合双语词典编纂的实践,继续新的理论探索与发现。

第一章

绪摇摇论

引摇摇子

双语词典的编纂,因人类翻译活动之需而萌生,也借助翻译的手段来实现,且始终是在为人类的翻译实践服务。双语词典的编纂与翻译有着难解之缘。然而,如果说《圣经》中“巴别塔”的故事总是让从事翻译的人们对自己的理想追求有或多或少的神圣感,那么,以翻译为主要手段的双语词典编纂者的工作却要现实而艰难得多,他们时时都要在抽象而且枯燥的有限语符空间里,于两种异域异质的语言文化的“不对等”之中苦苦谋求“对等”的理想,而且结果还往往不尽如人意。在这一点上,人们的怨言甚至是指责要远比理解多,就连受益较多的翻译家们也不例外。阿根廷的著名翻译家博尔赫斯(月(奥兰多))曾与萨瓦多(萨(奥兰多))有下面这样一段对话:

“巴(巴罗内)①我常常想这翻译成另一种文字究竟是怎么进行的,比如说翻译成中文。

萨(萨瓦多)这是永远无法验证的事情(笑声)。既然印欧系的语言是不可能翻译的,我们就可以猜想翻译成中文是怎么回事了。严格地说,任何翻译都是假的,没有准确的相等物。

博(博尔赫斯)这是词典造成的错误,词典让人们以为有相等物存在,可实际上是没有的。

……

萨:西班牙语的**葬**与法语就不是一回事。博尔赫斯,我

① 注:奥兰多·巴罗内参与了博尔赫斯与萨瓦多的对话并将他们的对话整理成《博尔赫斯与萨瓦多对话》一书出版。

认为,甚至不能说从西班牙语可以转成西班牙语,因为自第一个征服者一踏上美洲的土地;“~~造地~~造地”这个词就有了区别于在西班牙时的含义了。”^②

从上述对话中,我们清楚地看到,翻译家们对双语词典的批评,与其说是一种指责,不如说是一种误解。其实,大多数真正从事双语词典编纂工作的人,对这种语言文化间的种种差异多少都是有一定程度的认知的,也是有一定的心理或思想准备的,只是人类语际交流的现实要求迫使他们知难而进罢了。同样道理,人类的翻译实践也有难免不完美的遗憾。当然,也正因如此,我们的工作才有了意义。双语词典编纂也好,翻译活动也好,有了趋近完美的永恒空间。

双语词典的编纂工作,其实质就是在这种“不对等”的现实中寻求“对等”的理想。双语词典学的理论研究,自然也是应该围绕这个主题的。本书所关注的双语词典“译义”问题,就是针对传统双语词典“释义”研究与双语词典的主要编纂手段——翻译之间的理论脱节现象,提出的双语词典“译义”的现代多元本质论意义上的理性思考,也希望为双语词典“译义”正名。

在本书的绪论部分,作者将首先就本书的研究内容与目的作概要的介绍,然后对双语词典学理论研究领域中同类问题的研究情况进行必要的回顾、总结和分析。然后,在此基础上,作者将对本书研究所涉及的核心概念进行必要的界定,同时提出本书研究与前人研究不同的独特研究取向与理据。最后,作者将阐述本书研究在实践与理论方面的双重意义。

① 注:该词在西班牙语中是“平原”的意思,而在阿根廷,它是指“草原”。

② 奥尔兰多·巴罗内(整理)《博尔赫斯与萨瓦多对话》赵德明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55-156页。